

【高质量发展】

在转换中寻求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 相互促进之路

杨虎涛 唐 瑜

摘 要：在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等技术陷阱“三重陷阱”叠加的特定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方面存在相互促进与相互抑制两种可能。这受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大国来说，更有国家战略的不同考量。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对立统一关系更为具体而复杂，需要在相互转换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导向下寻求二者的最大交集。推动生态环境安全、能源与资源安全、国防安全、社会经济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转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如何缩短安全投入到发展动力的转换时滞、找准发展的突破口，是未来需要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典型事实；转换路径

作者简介：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36）；唐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基金项目：2024 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2024MZD026）

DOI 编码：10.19941/j.cnki.CN31-1957/F.2025.02.007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比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会议公报全文中，“安全”和“风险”这两个关键词的词频大幅提升。其中，“安全”一词从6次提高到16次，“风险”一词从1次提高到4次。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①到党的二十大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②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平安全良性互动”，^① 这一系列政策用语的变化，意味着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提升。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提出，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中等技术陷阱“三重陷阱”叠加的特定时期。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意味着在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等领域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卡脖子”和技术封锁的困难，而且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意味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分工秩序和贸易秩序将处于全球公共品供给失序、全球经济治理风险与挑战并存的状态，围绕着技术标准、贸易条款的冲突、摩擦和调整将不可避免；而中等技术陷阱则一方面意味着可参照、可借鉴的技术来源和知识来源集合缩小，另一方面意味着技术路径的选择风险加大，需要发挥技术创新的“红皇后效应”，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全球产业布局，通过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和固定用户群体，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

在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中等技术陷阱“三重陷阱”叠加的特定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内外的全方位安全营造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遇到了更为复杂的挑战：发展的难度加大，安全的风风险增加，多个领域的安全成本提高。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应对未来各个领域可能产生的风险，需要更加审慎和全面的系统变革。在多元目标下，高质量发展要为高水平安全提供“软”“硬”实力的基础；在开放条件下，高水平安全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稳定保障，个中关键在于找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转换”的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国家发展与安全：比较的视角

发展与安全一直都是国家治理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紧密相连且相互作用。狭义上的发展与安全，主要局限在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两者的关系是简单明了的：生产生活安全本身带来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福利的增加，生命价值的提高又通过人力资本为发展提供动能。但一般而言，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是指广义上的发展与安全，强调从国家治理和国际政治的维度出发，考虑多重维度意义上的安全和发展。发展和安全的两者的含义更为多元，互动关系也更为复杂。

长期以来，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被总结为“发展可以促进安全，安全可以保障发展”。一方面，发展可以为国防、公共安全、科技自主提供更多资源，从而提高整体安全水平，而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减少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安全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国际和国内的安全威胁，如战争、恐怖主义、环境灾害、能源危机等，都可能对国家的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然而，要形成促进和保障的动态关系并非易事。因为获得发展或创造安全都需要资源投入，在既定资源和时间约束条件下，两者往往面临权衡取舍。发展和安全之间也存在“发展忽视安全，安全抑制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在既定投入约束的前提下，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两者兼顾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偏重一方则可能陷入困境:忽视安全防范,短期内固然会有更多资源投入发展,但长期内发展却很可能因内、外的风险冲击而中断和停滞,甚至失去国家自主性;忽视发展基础,短期内也会创造出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但长期内这种安全又会因缺乏经济支持而陷入环境持续恶化、成本不断提高的困局。

也正因如此,在具体表现上,发展与安全既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抑制。在相互促进的情形下,发展为安全创造物质和文化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持续性保障。在相互抑制甚至进入恶性循环的情形下,则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度安全抑制了发展,如,一些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陷于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等安全问题,导致自我封闭、过度安全投入,使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更多约束;恶化了经济社会安全环境从而不得不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呈现出安全对发展的持续“挤出”效应;二是忽视安全的发展,导致发展本身具有脆弱性,典型如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不当、不力,发展过程中形成资源或市场依赖,导致发展中断甚至退步。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一些国家金融安全防范不当,因外部冲击而陷入债务危机、汇率危机,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①一些国家的发展过度依赖单一资源与外部环境,导致其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市场波动的制约。^②简言之,在战略选择不当、尺度把握失准的情况下,过度偏重安全投入而使发展受限,容易使国家面临发展与安全的双重困境,偏重短期发展而使安全存在突出短板,也难以以为持续的发展创造空间和提供保障。从安全的角度而言,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为趋近绝对的安全而不断增加安全投入终会陷入安全困境;反之,只顾发展而缺乏安全能力又容易成为霸权国家的被掠夺对象。^③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尺度和转换方式,使之形成良性循环,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战略能力的重要考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今,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就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上演。18世纪末到19世纪,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国力显著增强。这为英国建立庞大的海军和全球殖民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依靠工业化的机械、钢铁和船舶,英国又大大提高了其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使其能够控制全球贸易秩序,维持“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这是经济力量的增强与安全保障能力相互促进的典型表现。20世纪之后,英国的自治领、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发展收益和安全成本权衡之后的战略决策。

安全与发展的测度与量化分析也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包括全球和平指数、积极和平指数,以及盖洛普全球法律与秩序指数、基于互联网数据的 Numbeo 数据等。但后两者主要强调社会公共安全,侧重于个人安全感受。从国家能动性和国家能力的角度,全球和平指数和积极和平指数更具有综合性,且有一定

① Wade R, “The Asian Debt-and-development Crisis of 1997-?: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World Development*, 1998, Vol.26, No.8, pp.1535—1553.

② Venables A J, “Using Natural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Why Has It Proven So Difficult ? ”,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6, Vol.30, No.1, pp.161—184.

③ 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207页。

的差别。全球和平指数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和平状况，^①且这一指数同时包含了内部与外部安全的考量，可以作为安全程度在“结果”意义上的综合评估；而积极和平指数（Positive Peace Index）则更侧重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主动地创造与维护和平的能力。^②尽管从其构成来看，积极和平不仅包含了创造和维持安全和平的态度、组织和制度这种积极干预的能动因素，也涉及生态改善、公民安全感与幸福感等不同层级的结果和感受，但整体更强调的是社会经济的“复原力”。即，积极和平指数表现良好的国家更有可能保持稳定，也更容易从内部和外部冲击中恢复过来。^③因此，积极和平指数可以视为一种发展与安全相互平衡关系的表征。

单独就发展维度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更强调人的发展感受^④，该指数强调在既定安全投入和发展水平的综合环境条件下，国民的幸福感和发展程度，尤其是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与生活质量等。从单一的收入水平维度看，我们则可以直接以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为依据，即以人均GDP为标准，将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依照这种划分标准，我们从四组国家中共选取22个代表性国家。图1则是对这22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和平指数以及积极和平指数的整体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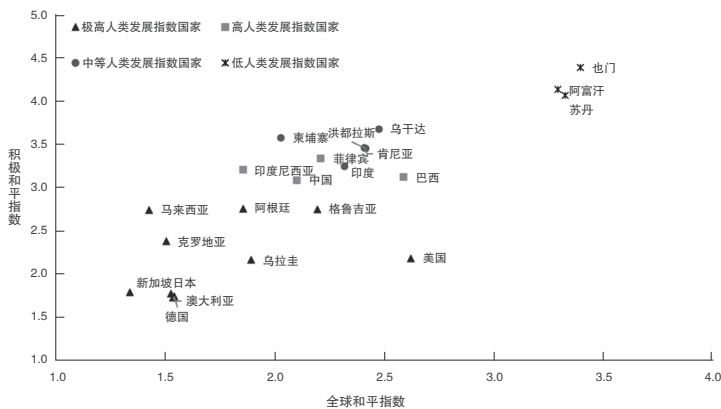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发展阶段代表性国家的发展与安全概览（202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2023/2024》、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数据绘制。

① 数据来源：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全球和平指数根据社会安全保障水平、持续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程度、军事化程度这三大类共23项指标加权计算而得，数值越低表示越和平。

② 数据来源：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积极和平指数描述和平与繁荣的必要条件，由邻里关系、信息流通、人力资本、营商环境、政府运作、资源分配、权利享有、腐败率这8个指标加权计算而得，拥有较低的数值表示更稳定、更容易从内部和外部的冲击中恢复。

③ 详见全球积极和平指数， <https://www.visionofhumanity.org/maps/positive-peace-index/#/>。

④ 数据来源：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 2023/2024》。人类发展指数是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与生活质量的综合反映。

从结构上看, 总体而言, 全球和平指数与积极和平指数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反映出发展与安全的正向关联。但从人类发展指数视角考察, 大多数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全球和平指数都在 1.5—2 之间, 积极和平指数都在 3 以下; 高人类发展指数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全球和平指数大多在 2—2.5 这一区间, 积极和平指数在 3—3.5 之间; 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积极和平指数在 3.5 上下; 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则表现出全球和平指数高于 3、积极和平指数高于 4 的“双高”特征。参照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四组分类, 低收入国家普遍在三个指数上都有着较差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诸如马来西亚、阿根廷等部分长期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而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同时也是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 它们的全球和平指数与日本、德国等高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但积极和平指数则处于高收入国家与中高等收入国家之间。同样有着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同属于高收入国家, 乌拉圭、克罗地亚的积极和平指数高于日本、德国, 乌拉圭的全球和平指数更与中高等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水平。这些国家表现出安全与发展不同程度的偏离, 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有着特殊的自然资源或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此外, 美国的积极和平指数同样高于日本、德国等高收入国家, 全球和平指数更是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 这与其国家发展、国际战略及其衍生的复杂国际关系密切相关。

对图 1 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与安全可以实现相互促进; (2)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与安全可能存在相互制约, 自然资源禀赋与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往往同时影响其发展与安全, 并导致其对发展或安全某一方面的偏重。同时, 从以上基本关系的呈现中可以发现, 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与安全也需要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与现实条件下加以考察。如果说全球和平指数代表安全结果, 那么积极和平指数更侧重于代表安全和发展的平衡水平(复原力), 而人类发展指数则更侧重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结果。从这三者的关系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 无论是就安全结果还是就安全和发展的平衡处理而言, 都不甚理想, 表现出安全与发展的双低水平, 高收入国家则普遍安全投入水平和安全结果均处于较高水平, 呈现出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发展状态。分歧比较大的是在中等发展区间的国家。这也意味着, 能否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和相互促进, 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迈向高收入国家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世界银行的中高低收入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人均 GDP, 而不是总体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大国博弈, 而大国首先体现在其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 GDP 排名前 25 的国家或地区占全球 GDP 的 84%, 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 尽管全球和平指数与地缘政治、历史、宗教、种族、文化等多种因素相关, 但并未对大国规模和影响力进行逐一区分。显而易见的是, 由于大国本身在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的行为及结果, 都会改变发展和安全的整体环境, 因此, 大国在发展与安全的权衡、取舍和转换上, 也必然不同于中小规模的国家 and 地区。

如图 2 所示, 从积极和平指数与全球和平指数的关系看, 大国的发展与安全同样表现出正向关联。在 GDP 排名前 25 的国家中, 有 19 个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4 个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1 个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1 个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 这些不同类别

国家在发展与安全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条块”特征与明显的个体差异性。

具体而言，大多数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都同时拥有较低的积极和平指数与全球和平指数，呈现出块状聚集；但在 GDP 规模排名前 25 的国家中，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在积极和平指数与全球和平指数两方面表现都更差，其中，俄罗斯、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处于更不利的境地。此外，法国、阿根廷、美国也呈现出对发展或安全不同程度的偏重。这种现象在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中更为显著，印度尼西亚、中国、巴西、墨西哥在积极和平指数方面处于同一水平，但在全球和平指数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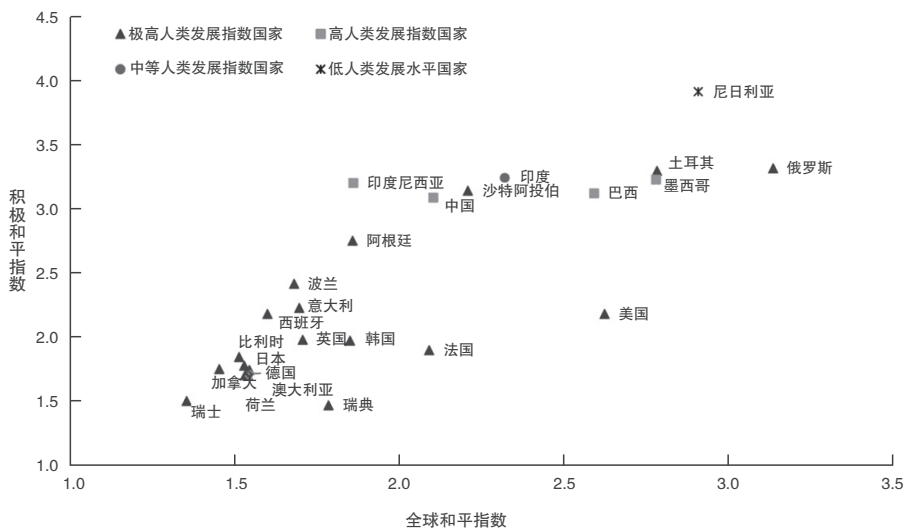


图2 全球 GDP 排名前 25 的国家发展与安全概览（2022 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2023/2024》、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数据绘制。

上述分析表明，从发展水平、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关系、整体安全状态考察，发展水平“双高”，也即人均 GDP 高、社会获得感和幸福感强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处于较稳定的整体安全状态，同时发展与安全也具有较高的平衡或协调程度，能否实现发展和安全的良性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与中等技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样，也同样存在中等安全陷阱。

二、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准确评估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科学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妥善处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相互促进，一直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历史地看，中国在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方面先后经历了以谋求国家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中心的生存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安全（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发展和安全统筹兼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大阶段，进而在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将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

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安全与发展的内涵以及相互作用和目标实现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安全”方面,安全的内涵逐步从单一向多元转变,从军事、政治与经济等传统安全的实现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并重。与之对应,中国先后经历了传统国家安全观(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转型国家安全观(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阶段。^②安全关注从初期的主要聚焦于外部威胁和内部稳定,到系统关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多个领域。在安全体系的构建上,逐步从单纯注重硬实力到软、硬并重:文化影响力、科技创新能力等“软实力”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与传统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基础。

在安全内涵演进的过程中,“发展”的内涵及其实现措施也呈现出了相应的变化。生存型发展主要面临国防安全、国家自主性等安全问题,所对应的发展也就高度聚焦于重化工体系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产业体系层次看,都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发追赶时期,从政治经济层次看,冷战压力下的国防安全都是立国的重要屏障。无论从工业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是从国防建设而言,重工业发展都既是安全的基础,也是发展的动力。但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从农业和轻工业抽取大量剩余,才能实现低成本快速工业化,这对于国内的民生改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城乡劳动力流动等诸多领域的调控治理就会形成另一重维度的安全与发展。在国内外、城乡的空间尺度上,长短期的时间维度上,在轻工、农业和重化工国防的结构调整上,都需要形成安全和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而言,生存型发展主要面临国防安全、国家自主性等安全问题,发展围绕着安全而展开。其目的在于新生政权的站起来、立得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安全持续时间较长,发展和安全的内涵也随之不断变化。总体上国防安全、地缘安全等问题退居次要位置,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发展。这主要是从战略上判断整体安全环境长期稳定,可以也应该“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③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粮食安全、城乡和区域协调问题尤为突出,发展主题较长一段时间内聚焦于农村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八次以改革为导向的三中全会部署中,就有十一届、十五届和十七届三次三中全会都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为全会主题。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又被置于突出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安全与发展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从安全而言,国内因供求紧平衡资源紧约束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与以前相比更加突出了,^④从外部而言,继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世界分工与

① 钟开斌:《统筹发展和安全:概念演化与理论转化》,《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74—87+162页。

② 钟开斌:《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战略选择》,《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10期,第23—3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④ 伍山林、周瑞:《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演进脉络和总体性分析》,《财经研究》2022年第11期,第4—18页。

贸易秩序开始进入深度变革，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营造沟壑、提醒“斯普特尼克时刻”。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自身主动构建、安全与发展能力的提升，都对认识安全与发展的内涵提出了新要求。国内安全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国家安全意味着全面、系统的大安全；与此同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继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到 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和发展战略导向。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仍然具有一般意义上发展与安全的基本内涵。从一般性的层次而言，发展仍然是安全的物质基础，安全仍然是发展的环境保障；忽视安全防范或发展基础，都可能使国家陷入发展与安全的困境。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构建，自然需要一个发展与安全协调共进的互动过程。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下，才能争取、组织和利用发展的机遇和资源，发展又可以为安全环境的营造提供更多的手段和措施。在二者的互动机制中，发展是决定性的，不发展或者低质量发展只会提高安全成本、降低发展收益。

但从特殊性的层次而言，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安全与发展的内涵。第一，高质量发展超越了传统的 GDP 增长模式，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它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注重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社会公平等多个维度。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增长模式更加绿色和可持续，资源使用更加合理，社会进步更加包容。这种发展模式，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数量的扩张，而是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第二，高水平安全不仅在内涵上超越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范畴，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而且在实现方式上也超越了“被动”和“封闭”的语境，是要在开放条件下，在人、财、物、信息充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前提的安全。其目标是确保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维持竞争优势，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简言之，相较于传统的发展与安全命题，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两者的领域更广、维度更高。

同样，在既定的时间、可投入资源约束条件下，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也存在矛盾性的一面：高质量发展往往需要大量投入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这可能导致短期内财政资金对公共安全领域的支出压力增大。反之，为了确保高水平安全，政府可能需要增加安全建设投入等，这又会挤占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在安全尺度上，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政府需要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开放更多领域，但过于宽松的监管环境可能会增加金融风险、环境污染等问题发生概率，威胁到金融安全和环境安全。在结构调整上，高质量发展要求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这必然涉及企业发展和就业问题。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经济效益的提升，还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同步实现。由此，如何把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度”，是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但从统一性看，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这是解决统筹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安全建设可以成为发展的机遇，发展可以自然形成安全屏障。生态安全的保障能够确保绿色发展的顺利推进，网络安全保障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国防安全可以保障整个国家的国土安全、提

升国际影响力。经济绿色化、网络安全化、国防安全现代化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容。生态维护和修复、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国防现代化等安全领域的建设,具有技术溢出和产业关联的正外部性,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正向作用。所谓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要找准发展和安全融合、转换的要点,把握二者的尺度,为发展和安全的相互转换、相互促进创造条件。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协同演进,在相互转换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导向下寻求二者的最大交集,是破题的关键。

三、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转换路径

围绕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经济转型中,寻求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最大交集,就必须实现重点领域内发展与安全的若干正反馈或互激式增长机制,通过需求引致创新、产业协同和技术溢出等机制,在发展和安全两个领域之间搭建技术和产业的融合渠道;同时防范化解发展与安全演进过程中产生的相互抑制因素。由此,需要探索建立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转换路径,支持二者在良性互动中协同演进。

(一) 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安全的相互转化

在生态环境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转化上,需要政府平衡生态环境安全与经济发展效益,对绿色创新和公共投资给予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刻画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 U 型关系,由此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一般模式,问题在于转折点并不会自动到来,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在于政府对环境安全的重视及行动支持。^①这一规律的存在说明政府环境治理与经济主体行为能够实现激励相容,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源于新技术的绿色创造效应和绿色修复效应。所谓绿色创造效应,即新技术本身可以创造出新的绿色经济领域和经济形态,如新型材料、储能、海上风电等产业,以及本地生产、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等低能耗经济形态;所谓绿色修复效应,即新一代技术可以通过对传统高能耗、污染型产业的升级改造或者对环境的修复,重新创造出新的部门分工。通过绿色创造效应和绿色修复效应,不仅可以创造出新的产业部门,从而带来就业和经济产出的增长,也可以实现新的使用价值类型的扩展。在这一过程中,可能缺乏绿色创新的参与约束,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污染定价过低、知识公共品的双重外部性,导致了绿色创新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②由此,政府对绿色产品技术市场的支持成为促进相互转化的关键。在市场之外,政府也直接投资于一些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同样不宜忽视这一路径上安全与发展转化的可能。例如,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在生态保护中促进了经济发展,其直接收益也远大于投入成本。^③实际上,生态环境安全

①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Vol.110, No.2, pp.353—377; 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4—11+36 页;王芳、曹一鸣、陈硕:《反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经济学(季刊)》2020 年第 1 期,第 81—100 页。

② 诺德豪斯:《绿色经济学》,李志青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年。

③ 王文凯、毕钰:《三北防护林的长期经济效益——基于空间断点的研究》,《经济科学》2024 年第 5 期,第 180—197 页。

的公共投资未必都缺乏直接的经济效益，发展与安全融合交汇的长期性、基础性项目也能够实现投资的收益回报，政府在这方面的战略性投入更具可持续性。

（二）转型发展与能源、自然资源安全的相互转化

能源、自然资源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转化围绕能源、自然资源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转型而展开。在碳中和进程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化石能源消费、能源电力需求增长的“双脱钩”，这有赖于能源系统转型。^①在转型过程中，能源生产端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投入，同时也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新能源产业如电动汽车的发展从需求端长期促进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成本收益的平衡，持续降低能源安全投入的成本。^②水资源、矿产资源安全方面的投入，同样可以转化为发展的动力。例如，南水北调工程通过水资源的空间结构调整，在保障华北地区用水安全的同时，缓解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③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转向；对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保障需要发展循环经济，如加快电动汽车电池回收体系建设等，^④这同时也将促进资源集约、循环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创新发展与国防安全的相互转化

国防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转化，基于一些科学知识 with 工程技术兼具军用和民用的双重属性，并且需要长期大量的技术攻关。一般而言，国防科技的先进性、前沿性是国防安全的重要保障，需要在经济、科技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军事应用投资。这类任务导向型发展实际上也是国家对创新系统的直接投资，以国家安全为杠杆来撬动工业技术与创新经济的发展。^⑤通过支持创建新的科学或工程知识体系、具有技术应用重叠的创新扩散、对新技术采购的订单支持，国防相关的采购和研发投资能够促进部门或经济整体创新绩效。^⑥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国防研发投入都曾在其公共研发预算中占有较大比重，主导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对民用经济创新也产生了广泛影响。^⑦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在国防安全的投资中发展出网络式合作结构，外包合同与风险资本为硅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当国防科技具有商业化可能的时候，就能直接通过技术的“军转民”应用作用于经济领域。如北斗导航系统，最

① 林伯强：《碳中和进程中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第56—71页。

② 郭剑锋、张雪美、曹琪等：《电动汽车助力我国能源安全与“碳达峰、碳中和”协同推进》，《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2期，第397—407页。

③ 谢泽宇、静峥、杨冕：《水资源约束缓解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第93—115页。

④ 应雄、汪寿阳、杨宇瑶：《能源转型下的锂、钴、镍资源需求及回收潜力分析——基于电动汽车的视角》，《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7期，第1226—1234页。

⑤ 封凯栋：《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⑥ Mowery D C,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9, Vol.34, No.5, pp.455—473.

⑦ Mowery D C, “Defense-related R&D as a Model for ‘Grand Challenges’ Technology Policies”, in *Research Policy*, 2012, Vol.41, No.10, pp.1703—1715.

初主要用于军事用途,近年来则逐步向民用领域开放,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农业、渔业、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相关行业的效率和效益,还促进了北斗产业链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在国防科技、军民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将部分先进的国防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生产力,推进国防安全部署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协同共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抓手。

(四) 协调开放发展与社会经济安全的相互转化

社会经济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转化,也应体现在空间平衡与经济协同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伴随着结构失衡,尤其表现为区域、城乡等空间发展不平衡。^①这不仅阻碍了共同富裕“先富帮后富”的机制发挥,也容易造成国家社会经济安全消极因素的累积,需要在发展中持续协调。^②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在结构和空间上的协调发展,本身也是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创造条件。因为经济的结构失衡、空间失衡不仅意味着资源配置存在改进空间,也使经济主体在机会获得、收益分配上存在不平等,造成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例如,兼具促进共同富裕和区域发展目标的东西部协作,就通过发挥创造效应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③

促进社会经济安全同样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协调,诸如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同样兼具发展与安全的考量。作为积极主动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在安全方面能够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和“金融霸权”,有助于西北“治边”、兼顾陆海以实现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平衡;在发展方面有利于破解增长的产能、资源与空间约束。自“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以来,中国与沿线各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作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一带一路”无疑也是发展与安全相互转化的重要桥梁。此外,在国际开放合作中,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投入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科技水平促进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安全环境的打造更有利于通过合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途径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

结语

统筹安全与发展,固然是要实现既要、又要甚至还要,但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于“先和后”的平衡、“强与弱”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将两者统一起来,将安全投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而言,只有强发展、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才能形成安全的天然屏障。在狭义的安全,也即日常的生产生活安全中,数智化监管、预警系统建设,本身就可以形成发展的技术动力,重要的是将这些领域中的安全投入和维护,融合到数字经济的全体系中去,或者形成供给侧的技术动能,或者形成需求端的拉动力量。

① 付才辉:《为增长而失衡——中国式发展的经验与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第3—36页。

② 唐瑜、胡安俊:《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特征事实、演变动力与长期影响》,《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第86—104页。

③ 张可云、冯晟、席强敏:《东西部协作政策效应评估——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12期,第61—79页。

在广义的安全层面，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都需要相应的农业技术、能源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创新发展，如生物科技、绿色能源、区块链、加密计算等，它们既是安全，也是发展。应当重视的是，如何缩短安全投入到发展动力的转换时滞，提升两者的转化效率；如何找准发展的突破口，在发展中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

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 年全球风险报告》披露了 2024—2025 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GRPS）的结果。结果显示，对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和技术各个领域的当期、短期和长期预期，都普遍存在悲观认知。GRPS 的受访者中，52% 的人预计短期内（未来两年）全球前景不明朗，31% 的受访者预计将出现动荡，23% 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武装冲突是当前的头号风险。《2025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我们生活在自冷战以来最分裂的时代之一。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中国既同时承受着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压力，也正处于迈向高收入国家，摆脱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自身的经济韧性和竞争力，同时通过高水平的安全保障体系来应对外部风险，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转换中寻求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相互促进具有深远的意义、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不仅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Exploring the Path to Mutual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in Transition

YANG Hutao, TANG Yu

Abstract: During a specific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the overlapping “triple traps” of the Thucydides Trap, Kindleberger Trap and Medium-level Technology Trap, achieving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serves as a crucial safeguard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an be either mutually reinforcing or mutually constraining, depending on factors such as the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major powers, national strategy considerations add another layer of complexit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is more concrete and complex, requiring a mindset that seeks their greatest common ground through mutual transformation rather than a binary trade-off. It is both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o promote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nergy and resource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socioeconomic secur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ving forward, a critical challenge will be reducing the time lag between security investments and their conversion into development momentum, while accurately identifying breakthrough points for development.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level security; typical facts; transformation path

（责任编辑：陈 彬）